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2月1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王朝书
版式编辑: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

深耕儿童文学理论的学者,也有敏锐的一线批评家,更有本身就是成就卓著的诗人。他们的文字汇聚一堂,形成了一种罕见的“内部”与“外部”视角的融合。诗人谈诗,往往带着创作的体温与技法的秘钥;学者论诗,则擅长引入历史坐标与理论框架;批评家品诗,则在审美直觉与理性分析间取得平衡。当金波的澄澈童心、高洪波的幽默机趣、王宜振的深邃哲思,与众多研究者冷静而热情的分析交织在一起时,我们看到的便不再是单向的文本解剖,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、多维度的精神对话。这种“创作主体”与“批评主体”智慧的叠加,生动地诠释了儿童诗歌作为一种文类健康发展的理想生态:创作实践为批评提供不竭的源泉和检验的标准,而严肃的批评则反过来为创作梳理传统、确立标高、开拓可能。本书正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有力推动,它证明,儿童诗歌的“重要”,不仅在于写了什么,更在于它被如何严肃地对待、如何深刻地言说。

历史经验与未来指向的时空叠加,开启了新的创造之门。本书的出版,其意义绝非止于对过去的总结与“封神”。它的深层价值,在于通过“总结儿童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先进经验”,为未来的开拓铺设了路基。全书对“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”的整体观照,本身就包含一种历史意识。它梳理了从“归来”的深情到“探索”的锐气,从“童心”的本色书写到现代意识、生命意识的悄然渗透这一复杂历程。哪些美学原则经受住了时间考验?哪些创作路径展现了蓬勃生机?批评又如何在与时代、与读者的互动中调整自身的话语方式?这些经验,无论是成功的启迪还是曲折的反思,都因这次系统的“叠加”而变得格外清晰、可供镜鉴。对于后来的创作者,这是一部蕴藏丰富营养与路标的“启示录”;对于研究者,这是一个奠定了坚实基础、也提出了新问题的“出发点”。它让儿童诗歌的探索,从此能够在一种自觉的、承前启后的历史感中进行,从而更有可能开拓“新局面”。

《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与批评研究》以其宏阔的视野、精心的编选和深刻的内涵,完成了一次漂亮的“亮点叠加”。它将散落的珍珠串成华美的项链,让微弱的星光聚成指路的灯塔。它告诉我们,儿童诗歌的天地,足够广阔,也足够深邃,值得最虔诚的书写和最严肃的思考。这本书的出版,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,更是送给所有相信诗歌能照亮童年、滋养生命的人们的一份厚重礼物。它标志着儿童诗歌研究一个自发、零散时代的结束,和一个自觉、系统的新时代的开始。

《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与批评研究》的问世,恰似一张珍贵的星图。它并非仅仅是文章的简单结集,而是一次具有自觉史学意识与理论雄心的学术建构。正如书名所揭示的,它将“创作”与“批评”并置,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洞见:儿童诗歌的鲜活生命,既在诗人灵动的创造中,也在批评家深刻的阐释与

评《中国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与批评研究》 当儿童诗歌的星空被完整测绘

文世奎
书评

对话里。这部著作的价值,正在于它将散布四十年光阴中的诸多“艺术亮点”——那些优秀的诗作、精辟的论见、代表性的诗人与学者——有选择、有结构地“叠加”起来,最终产生了一种震撼性的整体效应,让我们得以首次如此清晰、如此完整地窥见中国当代儿童诗歌这条银河的壮丽轮廓。

理论星光的聚焦与体系化叠加,照亮了曾被忽视的学术夜空。长期以来,相较于成人诗歌研究的汗牛充栋,儿童诗歌的批评与研究,常处于一种零散、即兴的状态,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理论提升。本书的“亮点效应”首要体现于此。主编谭五昌教授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,将六十余篇评论与研究文章,汇聚于金波、高洪波、王宜振、李少白等二十余位标志性诗人的“星座”之下。这并非简单汇编,而是一种“知识考古学”式的努力。它通过对四十余年重要文本的再解读、再评价,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当代儿童诗歌美学流变、精神谱系与形式探索的“史论结合”的初步书写。每一篇单独的文章或许是一束光,照亮一位诗人或一个议题;但当它们被精心编排、汇聚成书时,光芒便发生了奇妙的干涉与衍射,彼此补充、相互辩难,共同构建出一个立体的、动态的批评场域。读者既能纵览某位诗人创作的纵深,也能横比不同诗人风格的异同,更能感受到不同批评视角(学者的、诗人的、评论家的)碰撞出的思想火花。这种“叠加”,使原本可能孤立的“亮点”串联成“星座”,进而勾勒出整个“星系”的运转规律,其理论价值正在于这种从“点”到“面”再到“体”的学术建构。

创作与批评力量的“双星”叠加,彰显了文学生态的有机性。本书的另一个显著亮点,是其作者队伍的构成与代表性。入选的文章作者,既有



魅力,更体现在对文学艺术中劳动意象的深度挖掘,展现了劳动如何成为艺术创作的永恒源泉,又如何通过艺术表达获得精神升华。从《诗经》中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的制作骨器玉器的工艺比喻;到《考工记》对“弓人为弓、矢人为矢”的考工技术与“平明寻白羽,没在石棱中”的文、诗对应;从赵树理《套不住的手》对老农陈秉正那双“像小耙子”的劳动之手的传神写照——手掌四方、指头粗短、茧皮厚重,却能编织精巧的“叫哥哥”笊子,印证了“老茧之于手,如变焦镜头之于摄像机”(理查德·桑内特《匠人》一书中的科学结论之一)的“匠人书写”,到汪曾祺《陈小手》中产科医生“柔软细嫩”的专业之手的生动描摹;从李白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”的冶炼图景,以磅礴气势展现秋浦炼铜的火热场景,到张萱《捣练图》中纺织劳动的视觉呈现,四位妇女轮作捣练、两人理线、两人熨平、两人缝制,完整呈现丝织品加工的全流程,将劳动的协作之美定格为艺术经典……让人在重温劳动科技的同时,也加深了对文学艺术经典的欣赏。

作者一再以“考工”视角直见文学作品中的劳动叙事及其所潜藏的工艺奥秘、技术正确。《红楼梦》中,晴雯为宝玉补的雀金裘,作者考证出是以孔雀金线织成的云锦极品,补裘过程需精准把握经纬、巧妙搭配丝线,展现了纺织技艺的极致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中梁亦清雕琢的玉件,将“切磋琢磨”的玉雕工艺与人物的生命追求相结合,让劳动成为人格的写照,作者以其“考工”视角看出作者霍达于玉作细节描写的真实与专业。于“铁冶”篇中,作者在还原打铁技艺,同时不忘引用莫言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的相关细节描写,以及《世说新语》所载“嵇康打铁”的故事,都让人一读而两得。

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,以五重平纹经锦为材质,织出日月、云气、鸟兽纹样与篆体文字,将纺织工艺、天文观念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,更成为劳动跨界艺术与精神的巅峰之作。作者在解说这段护臂织锦时,本身就用了十分深情的语言,既赞美了劳动技艺,也书写了家国情怀。作者的解说,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散文,本身就是“文艺作品”。总体上,全书都留给读者这种强烈的印象。

文明创造的光辉循环

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的跨界叙事,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“劳动为本”文明底色的深度诠释。语言文字记录劳动经验,将具象的劳动动作抽象为语义符号,让实践智慧得以传承;劳动科技催生文明进步,从石器到铁器、从手工到机械,每一次工艺革新都推动生产力飞跃,进而为语言注入新的内涵;文学艺术升华劳动精神,将劳动的艰辛与壮美转化为审美对象,让劳动价值获得精神认同。汉字与汉词,器物与艺术,在书中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知循环:汉字(词)是劳动的符号载体,器物是劳动的物质结晶,艺术是劳动的精神镜像。

总而言之,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以劳动为根,在语言文字、劳动科技与文学艺术的跨界叙事中,构建起一幅立体的中华文明创造画卷。它不仅为汉字溯源提供了独特的劳动视角,更让我们重新认识到:劳动创造了人本身,劳动不仅创造了器物,更创造了承载文明的语言与艺术。这部作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,也是对劳动精神的当代弘扬,为文化传承与价值重构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,让劳动的光辉照亮文明的过往与未来。

词“实锤”“硬核”,也被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打造与打造出的石器,证明当下的语言创新实际上也暗含对远古劳动经验的呼应,真是令人恍然大悟。再则如“鼎盛”“鼎新”,源于青铜时代青铜鼎的礼器地位与青铜铸鼎的“黑科技”;作为比喻用语中的“钢铁”“淬炼”,则建基于铁器时代的高温熔炼与淬火成钢的“新质生产力”;“组织”“经纬”,脱胎于经静纬动的织造原理,经线的恒定与纬线的灵动,构成“有序结合”的语义基础。这些解读无不打破了语言与劳动的界限,揭示出汉语不仅是交流工具,更是劳动技术的结晶,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沉淀着先民的实践智慧与文明基因。

以劳动技艺为叙事骨干

换个角度看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,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以劳动为主线,串联起从石器、陶器、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的器物制造史,从农耕、建筑、冶金、纺织乃至以路道、航行的科技革新史,展现了劳动如何推动技术突破,技术又如何反哺劳动创造。作者一直怀着解词的兴趣,但对于劳动创造、技术工艺、工匠匠心则更津津乐道,使本书不仅是一本有关“中华词语”的趣味之书,更是一部旨在“考工”、致敬劳动创造的诚实之作。

从仰韶彩陶的“花瓣纹”到商周青铜冶炼的“六齐之术”,从青瓷的釉彩演进到云锦的提花工艺,作者既详述了陶窑升温、青铜冶炼、纺织机械等工艺秘笈——仰韶文化陶窑已设计火门、火膛、火道、窑算、窑室的精密结构,能将火候烧至950-1050℃;商代青铜器“六齐”精准控制铜锡配比,钟鼎之齐“六分其金而锡居一”,大刀之齐“三分其金而锡居一”,适配不同器物的功能需求;汉代水排以水力替代人力鼓风,通过曲柄连杆机构将水力转化为鼓风动力,比欧洲同类发明早11个世纪——更着重点明劳动中的科技含量。

人类学会用火,作者也予以浓墨重彩的书写,以“红火”“火红”“火热”为关键词和关联词。我们的“老熟人”——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于焉出场,作者解其钻木取火术中摩擦生热的科学原理,并历述华人先祖从燧石打火、钻木取火到用青铜凹镜向日取火的科技史,还向西方邀来盗火的普罗米修斯,还原盗火实为人类学会利用天火的实质,并“还原反应”出普罗米修斯劳动英雄的本色。这是词语、也是神话中的现实劳动场景。

其他如水车与纺车的联动推动“运转”“专业”等概念生成,纺车的锭子旋转与绳轮传动,让“专注”“专精”等词语找到了它们的母体;冶铁鼓风技术让“鼓舞”“鼓劲”成为精神表达,皮囊的反复推拉与炉火的越烧越旺,正暗合了“持续发力”的内在逻辑。书中对考古发现的解读更具说服力:郧县人遗址的手斧改写“中国无手斧”的西方定论,实证亚洲也是人类发祥地;铜绿山古铜矿的竖炉技术可连续加料、排渣,炉渣含铜量低于0.7%,与现代冶炼水平持平;马王堆素纱襌衣以49克的重重量展现汉代纺织的极致精度,其蚕丝纤度仅10.2-11.3旦。现代研究表明,需通过特殊喂养控制蚕体大小,方能还原此种极品蚕丝。这些案例,都是科技史中需要大书特书的章节,作者则细述之,将它们与语言文字史相互印证,清晰勾勒出从原始劳动、工匠劳动的技术革新乃至于革命的发展脉络,进而向词语创造转换的发生机制,凸显劳动不仅创造器物也创造语言的核心表达。

考工视角下的文艺作品

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的跨界

继《典籍里的中国工匠》广受赞誉之后,詹船海再度深耕,推出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一书。此书深入历史的劳动现场,生动呈现了“词语考古”这一独特视角的深刻魅力与重要价值。

全书紧扣“劳动”主线,围绕“劳动造人、劳动造器、劳动造词”层层推进,从石器打磨、火种掌握的文明原点,到陶铜玉漆的匠人传递,再到冶铁织衣的技艺绵延,以跨界融通的叙事笔法,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与劳动紧密相连的文化基因。书中贯通语言文字、劳动技术与文学艺术三大领域,熔汉字探源、工艺演变与文化表达于一炉——既是一部视角独到的汉字文化新解,也是一曲礼赞先民智慧与创造精神的劳动颂歌。文字扎实而鲜活,既有严谨的文献支撑,又不失生动的细节描摹,更贯穿着深厚的人文关怀,使那些曾被岁月尘封的劳动记忆与创造瞬间,重新焕发出温润而可感的光辉。

詹船海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评析

马忠

千年匠心凝于词

书评

以词语发生为轨迹

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最具创见之处,在于揭开了汉字与劳动共生共长的密切关系,让每一个词语都成为可触摸的劳动场景化石。从“人”字甲骨文所凸显的手足分工(左侧为臂、右侧为腿,暗含“手是人之本质”的隐喻),到“抓”“握”“掌握”等词源于石器时代紧握石器的动作——那大拇指与四指相对的抓握姿态,正是这些词义最初的核心。从磨石“精为砥,粗为砺”的材质辨析,再通过打磨刀技术中粗磨、细磨工艺的还原,更让我们认识及“砥砺”何以成为宏大用词;“绩”源自绩麻时捻接纤维、将零散纤维捻成丝线的过程,正是“积短为长、积少为多”的认知来源,因而有了我们最为熟知的“成绩”一词。

作者对复合词的溯源尤为精妙,比如“模范”本是青铜器铸造的内模外范,内模定形、外范固样的工艺逻辑,延伸为“榜样”的喻义;“陶冶”脱胎于制陶与冶金的工艺融合。陶的抟土成型与冶的熔金成器,这两者交融,便奠定了“培育人才”这一概念的原始雏形;“锦绣”见证丝织品从实用到审美的升华,锦以彩色丝线织成花纹,绣以穿针引线勾描图案,二者结合既指精美织物,更喻灿烂篇章;“鼓舞”源自冶铁鼓风的劳动节奏,皮囊鼓风的持续动力,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激励之意。需要指出的是,作者对“鼓舞”一词的追根溯源,还只是一家之言,颇有自作发明之意,但亦能自圆其说,予人启发。

作者一直捕捉着词语随劳动演进的轨迹,或遥远的呼应。石器时代对石器的“打造”“打磨”,呼应着我们今天赋予“打造”“打磨”两词的引申之义,并且顺便拈出“石(实)打石(实)”这个口头语的成果。就连网络热